

旬邑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旬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 革命先烈 ·

壮志撼天地 浩气昭明月

——崔廷儒烈士传略

……郑学英 王少民 胡海珍 (1 -- 44)

缅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崔廷儒同志

……………严克伦 (45 — 59)

顽强不息 视死如归

——忆崔廷儒烈士

……………蒙定军 (60 — 69)

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战士

——忆崔廷儒烈士

.....孙作宾 (70—91)

· 边区文化教育 ·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在旬办学始末

.....县党史办供稿 (92—98)

抗日荣校在坪坊村的一段经过

.....罗秉歧 (99—105)

回忆母校关中师范

.....白忠厚 (106—109)

对关中师范的回忆

.....卢元仓 (110—113)

对可爱的“关师”、“联中”母校的回忆

.....周金玉 (114—125)

忆赤水县秧歌队

.....张秉勤 (126—128)

边区剧团来到赤水县

.....张秉勤 (129—131)

一位忠诚老区小学教育事业的好园丁

——忆吕怀瑞先生

.....崔志文 (132—136)

· 革命斗争 ·

我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前后后

.....县党史办供稿 (137—143)

记十次反摩擦战斗

.....县党史办供稿 (144—151)

回忆旬邑支队的反围剿与袭取龙高的胜利

.....谈立杰 (152—158)

长人民志气，灭敌人威风

——记赤水县自卫军检阅大会

张秉勤述 王新民李兴润整写(159—161)

智勇穿越封锁线

——忆我地下工作同志的斗争

.....崔志文 (162—168)

初上革命道路的回忆

..... **崔平元** (169—173)

怀念我的父亲王子健

.....王崇行 (174—178)

怀念姚宗白同志

.....崔志文 (179—183)

· 历史人物遗址 ·

唐勋臣名将侯君集初考

.....王清秀 (184—192)

枸邑县始置时间辨

.....刘汉文 (193—200)

旬邑县境内的秦直道遗址

.....樊志文 (201—203)

我县中草药材知多少

.....县卫生志编写小组 (204—207)

忆四十年前的青年从军

.....	王崇行	(208—211)
唐宗介先生给家乡人民的信		
.....	唐宗介 张佐鹏	(212—217)
“联中”难忘的母校		
.....	师应文	(218—222)

壮志撼天地 浩气昭日月

崔景岳烈士传略

郑学英

王少民

胡海珍

1941年4月17日的夜晚，黑幕沉沉，风沙满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塞上古城银川。在城隍庙后边的一块空地上，数十名国民党士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新挖的埋人土坑，张着黑黝黝的大口，贪婪地要吞噬革命者和抗日志士。

一位双腿伤残的共产党员，面对蒋匪制造的血雨腥风，面对一排排长枪刺刀、面对将要吞噬自己的埋人坑，镇静自若、毫不慌乱，语气缓缓地说：

“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的光荣。

这位共产党员，就是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中共宁夏工委书记的崔景岳烈士。崔景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铁骨铮铮，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

一、旬邑起义中的小勇士

崔景岳，乳名崔运乾，原名崔廷儒，曾化名崔皓、剑仁等，1911年古历11月3日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1岁入本村小学，14岁考入宝塔高等小学。由于家贫、学资不足，他常常上山砍柴、挖药材、拾酸枣、砸桃、杏仁卖，解决学费问题，读书用功，成绩优秀。

在宝塔高小任教的共产党员许才升同志，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组织革命活动。景岳积极参加，表现突出，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陕西地区的革命洪流汹涌向前，年仅十六岁的景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向旬邑反动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被难烈士的纪念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军阀的罪行。暑期，许才升同志举办了讲习会，以教授英语为名，组织共产党和进步师生进行政治理论训练。景岳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了《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马列主义著作，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下半年，崔景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6、7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西清党反共，镇压革命。旬邑县的土豪劣绅也发生了一片反革命叫嚣声，与各地新老军阀，遥相呼应。反动县长庞天赖封闭了农民协会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逮捕了

共产党王日省、王延壁、王子健等同志，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旬邑。但是景岳坚信“革命大有希望，共产主义事业必将胜利”，继续坚持革命，奔波于斗争的最前列。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及时在武汉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在“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鼓舞下，中共陕西省委继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于1928年2月18日在西安召开了省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造成革命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旬邑县党的力量，省委从外抽调了许多得力的干部到旬邑，加强和整顿了旬邑地下党的组织，在县中心支部之下，还在郝村、蒲家堡等地建立了农村支部，景岳同志当时就在蒲家堡支部过组织生活，积极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农民向豪绅斗争。

1928年5月6日，敌县政府派来一个

催粮委员到旬邑县清水原的郝村一带催粮，强逼农民三日内交齐粮款，说什么“我一手拿了生死簿、一手拿了勾魂笔，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残酷的压榨，激怒了农民群众。地下党组织决定抓住时机，发动起义。当日，许才升同志以鸡毛传贴，发动清水原各村群众数百人，以抗粮“交农”为名，扛着锄头、铁铤、叉耙、梭标等武器，打死了郝村的一个大地主，接着便向旬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队伍。崔景岳看到这形势，非常高兴，途经吕家村时，与起义农民一起，抄了大地主吕善堂的家。队伍来到赵家村，许才升主持召开干部会，研究部署围攻县城计划，决定派崔景岳、侯天佐等同志潜入县城，与城内党组织一起，在攻城时作内应。

5月7日拂晓，由许才升同志领导的起义队伍，到达坡头原畔，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点起一堆大火，作为信号，又很快来到县城东

门外；城内党组织已于起义前一天作好准备，崔景岳为保证完成任务、不回家，夜宿宝塔小学，和几个战友，时时望着原畔。忽然，看见原畔上火光冲天，景岳高兴的跳了起来，崔维俊、张幼房等同志互相掩护，拿着斧头冲到东城门下，砸开了铁锁，打开了城门。于是起义队伍如决堤洪水，汹涌澎湃，冲进县城，守城军警见势不妙，空放几枪，急忙逃跑。

起义队伍入城后，先到粮秣处，处死了四个管粮人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接着涌进伪县政府，打死了看守所长、解除了警戒人员的武装，救出了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在攻打天主教堂时，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非常狡猾，他们看到农民部队有些混乱，便把数百银元从楼上撒下去，乘群众拾钱的机会，急忙向彬县方向逃去。景岳自己不拾银元，还大声喊：“别上当、别拾钱！”可是，不少农民，见钱就拾，队伍大乱，急得景岳满头大汗。

为了巩固起义成果，党领导人民群众成立

了临时苏维埃工农政府和红军渭北游击支队。苏维埃政府设立在宝塔小学院内，校门两边挂着红布制作的镰刀斧头红旗，写着“要有阶级性，勿作时代落伍者”的对联。在暴动胜利的日子里，景岳一直住在宝塔小学院内，上下联络，书写标语，站岗放哨。尽管他离学校只有二里路，但他日夜奔忙，很少回家。

旬邑革命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他们慌忙调兵遣将来镇压革命，又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败类刘兴汉等人，用散布谣言，威胁恐吓等手段，煽动叛乱。景岳同志警惕性很高，一天早晨，天刚亮，他听见外边有动静，迅速穿上衣服，跃出宿舍，发现情况，忙高声大喊：“快起来，发生事情啦”！这时候叛乱分子一窝蜂似的涌进学校，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景岳急中生智，避过了敌人的搜捕，与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红军渭北支队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长侯天佐等同志一起，带领一部分起义群众撤出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二、上下求索的自觉战士

旬邑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抓人，杀人。不久后，崔景岳暂住舅父家，一面读书学习，一面苦苦思索着旬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亲身经历的无数事实，使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开始认识到：闹革命、不掌握武装、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巩固的核心也不行。于是，他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抓党的建设，抓革命武装。

1929年前后，关中连年大旱，饥民成群，饿殍遍野，加上流行虎列拉（霍乱），连饿带病，死亡贫苦农民数百万。有些饥民，铤而走险，结伙上山，打富济贫，群众称之为“刀客”。更多的饥民则提篮讨饭，到处流浪，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据这种情况，党派景岳和许多优秀党员到群众革命高涨的渭北一带，领导饥民吃大户，分粮食。他们在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地方，还成立了灾民自救军，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政府下乡搜粮保安队，在公路沿夺取官府车队的物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0年冬，陇东驻军杨保城部在泾川办了一所军事学校，招收学员。景岳与崔维俊、张幼房等党员在他家炕上，一边学习上级指示、一边研究怎么办。崔景岳说：“旬邑起义时，农民队伍虽然很大，人数很多，但没有多少枪，都是梭标镢头、有几支枪，还被坏分子拿着，因而敌人进攻时，无法战斗。这个教训，说明了革命离不开枪杆子。现在杨保城招兵，我愿去敌人军队中工作，联络志同道合的人，相机夺取武装。”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他联络了蒙定军，辛俊贤等同志去该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混成旅执法队担任司书。他利用司书职务，秘密宣传革命，结交朋友。短短几个月时间，他联络了几十名进步官兵进行革命活动，影响之大，使敌震惊。于是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旬邑县委，当时县委机关就设在景岳家的窑洞内，条件虽艰苦，工作却很活跃，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人焦维炽、李艮等同志还多次来此巡视和布置工作。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袁岳炼和原红军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各地区和各机关的党员名单。国民党特务立即照名单缉人，捕杀了数百名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目睹敌人的疯狂捕杀和叛徒的无耻行径，景岳非常愤慨，万分焦急，他说，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不能眼看敌人横行，不能坐看党组织垮台，不能坐等中央指示，而应发扬共产党员前仆后继，主动革命的精神，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用实际行动与中央取得联系。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一带回到西安，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于海峰等同志联系，研究对策。大家认为，不管形势多么险恶，都要坚定信心，挽救危局，首先要把党组织恢复起来。有了坚强的党组织，才能力挽狂澜，联络同志，积蓄力量，配合红军支援革命根据地。为此，经过多次磋商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孙作宾任组织委员。临时省委决定，先把主要力量放在杨虎

城部队和各地民团中活动，发展组织，搞兵运，抓武器；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临时省委还领导成立了一个特工队，专门打击叛徒特务，为党组织筹款。11月，临时省委书记余海峰在开展学运时被捕，其他同志外出活动。崔景岳和孙作宾两人迎着白色恐怖，在西安继续坚持斗争。

1934年春，团中央派魏光波同志由上海来西安与临时省委接头，并带来了中央指示，在西安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精神和陕西的政治形势以后，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中心市委书记由魏光波同志担任，景岳同志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军事工作，参加中心市委工作的还有严克伦、孙作宾、苗建平、张一平、刘秀珍等同志。

由于环境变化，上海党团组织与市中心市委之间的联系不久也断绝了，党的组织活动极其困难，有时连住机关的一所房子也找不到。为此，景岳同志被迫到渭北找来谈国帆同志。